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王庆成 主编

中国早期 工业化

——盛宣怀（一八四四—一九一六）

和官督商办企业

〔美〕费维恺 著

虞和平 译 吴乾兑 校





2 022 0464 9

中国早期工业化

——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

〔美〕费维恺 著

虞和平 译

吴乾兑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宝良
责任校对：李钊祥
封面设计：式一
版式设计：王丹丹

中国早期工业化

Zhongguo Zaoqi Gongyehua

〔美〕费维恺 著
虞和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印刷厂 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63千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册

ISBN 7-5004-0721-1/K·84 定价：5.40元

800016/10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以近代中国绅士资本家盛宣怀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中国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四家官督商办企业为主线，大量使用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详细阐述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策、社会和制度诸问题，并将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令人深刻反思的问题。本书所涉及到的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尚未解决的某些政策问题，为当今工业的现代化计划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编辑说明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了更好地适应于时代，更有益于社会，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继续前进，获得新的发展。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发展、提高我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途径之一。因此，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选择外国学者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侧重于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参考借鉴意义的专著。

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指导思想，大多与中国学者不同。我们选译出版某书，并不意味着同意它的观点。书中的优点、缺点和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我们缺少编辑这类译丛的经验，所知所见又有限，希望史学界同行给予关心、支持，提出批评建议，并且推荐选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1987年3月

《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庆成

成 员

马汝珩	马晓光	王庆成	叶凤美
刘存宽	陈宝辉	张振鹜	张寄谦
龚书铎	谢亮生	虞和平	

前 言

《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与官督商办企业》一书，是通过分析盛宣怀控制下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经历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的。这对中国同行来说，是既熟悉而又颇为生疏的。所谓熟悉，是说对盛宣怀与官督商办洋务企业早已不乏研究；所谓生疏，是说费维恺教授从新的角度——工业化——对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是中国学者较少尝试的。费维恺教授运用了历史研究中的“近代化”理论，把工业化看作是近代化的一个中心内容。他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1914年之前）作了综合研究，同时把官督商办洋务企业的兴衰过程放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不是一般地借用近代化理论的模式，而是把这一理论渗透于对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背景、自身特点和兴衰原因的分析之中。作者通过这样的研究，分析盛宣怀控制下的四个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过程，论证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种种阻力，同时也指出了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洋务运动、洋务企业的研究在我国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我们有不少优秀的个案研究成果，也有一些整体性的考察，但较少从工业化——近代化的角度把综合研究与具体历史进程结合起来的著作。《中国早期工业化》一书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是极有教益的。

费维恺教授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规定在“经济史和社会史

的范围之内”。《中国早期工业化》在前三章中分析了官督商办企业存在时期的社会环境和盛宣怀的个人素质，并在后三章中把这些社会情况和人员的因素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过程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从传统价值观、官商关系、地方权力等方面分析了官督商办企业发展的阻力；从儒家精神、家族纽带、地方主义等方面分析了盛宣怀发挥“企业家功能”的困难，所以《中国早期工业化》不仅研究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而且体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结合。这无论对于我国的经济史学者或社会史学者也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早期工业化》把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的近代化作了有意义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中日近代化的成果、动力、历史基础、国内市场、技术引进、政府态度、制度改革、人员素质、管理水平、西方压力、传统价值观等方面的比较，使读者得以从日本近代工业化的成功过程中和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过程中看到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致败之因。这也是本书的特色之一。

《中国早期工业化》利用了不少国内学者不易得到的外文资料。如《马士通信集》就是研究洋务企业所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马士曾在中国海关工作，又在轮船招商局任职多年，他与德璀琳和中国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盛宣怀关系密切，在与这些人物的通信中披露了招商局许多经营管理的弊病，也表示了他作为一个外国雇员对这些弊病的看法。当然，由于《中国早期工业化》出版于1958年，不可能利用中国学者近三十年来发掘整理的档案资料，这在费维恺教授为中译本写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了。

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以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是近

代化。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革命。我觉得，在充分重视近代中国这一根本问题的同时，适当采用“近代化”的概念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是有益的；这两种看法并不一定需要互相排斥，它们可以互相补充。“近代化”的概念可以使明确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艰难过程的历史内容；而它之所以不能顺利实现，概括说来也正是由于外国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障碍。费维恺教授把中国近代化不能顺利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要求”，“对西方冲击的全面反应的不足”；二是中国固有的“制度上和思想上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障碍”。他的分析，有一些是与中国学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但的确也有不同。“西方的冲击”是美国学者在研究19~20世纪中国和外国关系时常用的概念。但这种关系的基本方面应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西方的冲击”对中国的近代化固然有刺激的作用，但外国侵略对中国近代化的障碍，恐怕更是明显的事实。当然，费维恺教授也没有完全忽视这些事实。

费维恺教授长期在美国密执安大学任教。曾任该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主任。新近当选为美国亚洲协会会长。他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尤长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他的著作甚丰，除了《中国早期工业化》之外，主要的著作还有：《中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61年版)、《19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汉冶萍公司的实例》(1964年版)、《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年版)、《中国经济史，1870~1949》(上、下册，1968、1969年版)、《19世纪中国的叛乱》(1975年版)、《中华民国的经济趋势，1912~1949》(1977年版)、《20世纪初期外

国在华企业》(1976年版)。现在，他又在进行“城市建筑与中国近代化”的专题研究。我接触费维恺教授的著作，首先是在1979年拜读他的《19世纪中国的叛乱》，这本书对太平天国和同时期其他造反的分析比较，使我受到教益。但迟至1983年我去美国访问、研究才有机会认识他。费维恺教授是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先驱者，早在1972年就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曾会见他和夫人梅仪慈教授。以后又多次来中国访问、研究。我相信，《中国早期工业化》中译本的出版，将有益于中国史学界，有助于中美两国史学界的互相了解和交流。

王庆成

中文版序言

当《中国早期工业化》在 1958 年首次出版之时，现在已可供学者利用的许多有关盛宣怀生活和经历的原始资料尚未开放。我特指选自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盛宣怀档案，并由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这一宏大的文献卷帙。此外，我也注意到了 1960 年出版的《盛宣怀未刊信稿》和 1987 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晚清百位名人致盛宣怀函的九卷漂亮的影印本。除了这些已出版的资料之外，如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的档案资料，现在也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对学术研究开放。

至于我的著作，主要依靠了《愚斋存稿》中的盛宣怀的已刊文件、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已刊文件，以及当时的西文和日文资料。

毫无疑问，这些丰富资料的获得，必然会大大地增加我们对盛宣怀的生活及其企业活动的详细了解。现在我似乎觉得能够更严密地探索如下一些论题和问题：

1. 盛宣怀对其某些企业的“实际参与”关系。我有一种这样的印象，与更为典型的晚清官僚相对照，在某些场合盛宣怀是一位真正富有革新精神的经营者，这与其企业的业务成就至为相关。他的才智和随时别出心裁地注意细节——他在 1899—1910 年对商约谈判的处理就是如此——或许使他未能获得应有的信任。在当时的普遍困难的环境中，他的行动

常常是与众不同的。

2. 盛宣怀的合作者的地位。这是由于，这种值得称誉的履历可以在盛宣怀与之合作开办企业的人们的非凡才能中找到，诸如郑观应、马建忠、严信厚，等等。

3. 上述意在说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失败”也许并非如我在 30 年前所结论的那样完全或明显。当一件事情从零开始时，它需要充分的时间使复利——积累的增长——的动力变得显而易见。当然，晚清政治缺乏上下联系仍然是盛宣怀的工业冒险的直接成果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现在一样，官僚政治、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率的问题都是重要的变项。但是与同时代的其他企业相比，这些因素在盛氏企业中的消极作用要比在其他企业中少一些。例如，儒家精神对他们的经济行为的影响，现在看来可能比我们曾已简单作出的许多结论更为模糊得多。

盛宣怀的经历及其毕生所从事的为数众多的设在上海的工业、金融、教育和公用企业，仍然是现代中国史学家值得考虑的重要课题。现在，资料的便利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可能会较大地超越《中国早期工业化》中所力图作出的“基本”评价。

费维恺

1988 年 10 月 17 日于密执安大学

序

本书是《哈佛东亚研究》丛刊的第一册，它在若干方面体现了该丛刊的总目的。首先，它大量使用了中文、日文和西文的可靠资料。其次，它把近代社会科学的适当观念运用于这些关于东亚的资料。此外，费维恺先生还把中国的经验与日本和西方的经验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比较。我们认为，这一切给今后多种语言和多种学科的比较研究指出了方向，而又不丧失传统的缜密的专题历史研究的优点。

本书也接触到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尚未解决的某些政策问题。费维恺先生对中国早期发展工业的努力、其困难的性质和进展的迟缓所作的分析，给现在的北京政府所领导的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借鉴。

自大的中国人在与条件优越的西方人的接触中受到了侮辱，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最终总会激起一个不惜以任何代价的巨大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努力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那么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陆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或许就不那么急了。还有日本的例子，它的工业化过程是如此明显的成功，而给政治和军事方面带来的是如此的灾难，这表明中国在其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经历，事实上是不容易选择的。

本书关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经济成就和问题、人事和政

策、社会和制度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最初近似物，一条基线，
并由此绘制出中国长期停滞和革命推进的模式。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

鸣谢

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和杨联陞教授，他们几年来给了我许多指导，并仔细地审阅了本书的打印稿。

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博士审阅了本书的打印稿，对我所论述的一些经济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我从中得到教益。我也感谢刘广京博士友好地允许我参考他的著作——《外国在华造船工业的发展》。卷首的照片复制自阿诺德·赖特 (Arnold Wright) 编辑的《20世纪中国商埠志》(1908年版)第525页。

我所引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日本图书馆”中找来的。任何一位曾经认真利用过朱 (A. K. Chiu) 博士藏书的人，都会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不仅因为他的直接帮助，而且因为他搜集这些大量研究资料的精力和技巧。我还得感谢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管理员沃华德·林顿 (Howard Linton) 先生；感谢查理·萨克来·加德纳 (Charles S. Gardner) 博士，他慨然应允我使用他所珍藏的清代资料。

我感谢王培娣 (Betty Wang) 女士为本书制定书目提要 and 专用词汇表，读者看后定会感谢她那比我高明的手法。

最后，我衷心感谢“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该学社的资助；同时对福特基金会“外国研究计划”拨给追加补助金也深表谢意。

费维恺

目 录

第一章 官督商办体制：“官为保护，商为经营”	(1)
第一节 中国工业化的障碍	(1)
第二节 “官督商办”的由来和内容	(11)
第三节 工业化的成果与地方权力	(15)
第四节 来自通商口岸的商人资本	(22)
第五节 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	(30)
第六节 官僚的勒索	(36)
第七节 有限的专利权	(39)
第二章 清末的经济状况	(42)
第一节 经济思想	(42)
第二节 政府财政	(54)
第三节 贸易和商业	(66)
第三章 官僚企业家盛宣怀(1844—1916)	(79)
第一节 生平	(80)
第二节 家世	(116)
第三节 江苏绅士中的一员	(121)
第四节 官僚的角色	(124)
第四章 轮船招商局：商人经营	(133)
第一节 轮船招商局的起源	(134)
第二节 公司所经历的四个年代：1873—1913	(138)
第三节 公司的业务	(142)
第四节 经营管理者	(148)

第五节	轮船招商局的财务	(168)
第六节	官僚主义的经营管理	(188)
第七节	舞弊问题	(199)
第五章	轮船招商局:官方监督	(205)
第一节	官方监督(1872—1895)	(205)
第二节	官方监督(1895—1908)	(218)
第三节	董事会对邮传部(1909—1911)	(221)
第四节	漕粮的运输和免税特权	(228)
第五节	官方勒索	(234)
第六节	轮船招商局是一个成功的商办企业吗	(240)
第六章	三家官督商办企业	(256)
第一节	盛宣怀的“帝国”	(256)
第二节	中国电报总局	(257)
第三节	华盛纺织厂	(284)
第四节	中国通商银行	(310)
第七章	结论:走向“官僚资本主义”	(332)
	引证外文书目	(343)
	译名对照表	(361)